

积极探索城乡区域共富新路

魏后凯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和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研究。

不久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指出“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缩小‘三大差距’,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努力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省域范例”。当下,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城乡区域共富新路,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途径。浙江作为经济大省,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走城乡区域协调的全域共富之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既要“富裕”,也要“共享”,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可以说,共同富裕既是一种全面富裕和全民共富的状态,也是一个共建共富、逐步共富的长期过程。从全面富裕看,共同富裕是一种多领域、多维度的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有机统一;从全民共富看,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都要富裕,要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但并非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从共建共富看,共同富裕需要全民参与和共同建设,在共建中实现共享;从逐步共富看,共同富裕并非同时富裕,需要

通过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

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缩小“三大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从国土空间角度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走城乡区域协调的全域共富之路,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既包括城市和乡村,也包括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老少边”地区在内的全域现代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域共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并非少部分地区和城市的富裕,而是各地区和城乡都要富裕,尽管其富裕程度和实现时间会有所差异。可以说,全域共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空间体现。

近年来,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积极大胆探索,开局良好,成效显著,为全面建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也应该看到,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浙江仍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固底板、补短板、强弱项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首先,保障粮食安全是底线要求和底板任务。浙江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0%左右,以有限资源支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更多。其次,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必须面对的问题。浙江外来人口较多,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大,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六难”,即“增收难、居住难、就学难、保障难、融入难、安心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浙江的农村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推进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仍需持续努力。

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全面对接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浙江应通过示范区建设,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全面对接,聚焦乡村产业、公共服务、以城带乡、农民福祉

等关键问题,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全面打造高质量的城乡协调发展引领区,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一是筑牢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这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只有乡村产业兴旺了,才能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浙江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浙江应在保障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农村功能定位为导向,突出乡村特色,加快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二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普惠均等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底线任务。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核心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居民收入位居各省区前列,城乡区域发展相对均衡,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也是《方案》中提出的重点工作之一。浙江要按照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要求和更高标准,着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质量和效率,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三是扎实推进以城带乡。城市与乡村是一个互补互促、互利互惠的有机整体。城市是引领、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的发动机,乡村则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土壤,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和城市的带动。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浙江必须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将城市的资本、人才、技术和服务优势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形成“1+1>2”的合力效应,使农村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发展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四是全面增进农民福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人民福祉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不能采取人为的“削高填低”办法,而应该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全面增进农民福祉,实现高水平的城乡共享繁荣。

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及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它是对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和领域提出的新要求。而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它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我们所追求的区域协调发展,其实就是区域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应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走区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民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并完全融入城镇社会的过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实现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既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义。

二是不断提高省域一体化水平。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跨界区域、城市乡村等区域板块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到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城乡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面实现,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整体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浙江要全方位参与并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在县域、市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省域一体化,切实提高省域一体化水平,为实现全域共富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深化完善先富帮后富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地区由于发展条件和基础的不同,发展速度必定会有快有慢、水平会有高有低,有的地区因起步较早、条件较好率先富裕起来了,而有的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中,必须在建立有效市场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深化完善先富帮后富、先富帮后富机制,以推动实现全域共同富裕。(本报记者 吴晔 张竞晓 采访整理)

因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叠加而产生的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对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的实践探索,恰恰是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发展比较均衡的包容性发展,以“千万工程”为抓手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发展。这些浙江探索,不仅有全国意义,而且对“全球南方”也具有参考价值。

乡村发展与富民经济

无工不强,无商不富。从永嘉桥头的纽扣,到诸暨大唐的袜子,再到永康的小五金,浙江人靠着“四千精神”,开启农村就地工业化的尝试。随后,义乌人“无中生有”,把一个资源贫乏的浙中小城,打造成了闻名遐迩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再后来,缙云县通过品牌化和产业化,把当地民间小吃“缙云烧饼”打造成了一个产值达38.9亿元的“乡愁富民产业”。直面美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经验‘全球南方’国家学不了”的观点,来自津巴布韦的浙大博士生米莱以对缙云烧饼产业的深入研究为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位生长于津巴布韦农村的青年学子认为,虽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就地工业化的条件,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土特产,挖掘地方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在地富民产业,是“全球南方”国家够得着、学得了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绿色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如影随形。虽然“全球南方”是生态富集地区,也有丰富的本土生态保护知识,但是殖民主义时代的破坏、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环境代价转嫁、本国经济发展的压力、西方知识体系的霸权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让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依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中挣扎。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浙江的绿色发展前沿思想与实践,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和实践样本,打开了人类生态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2024年秋天第一次来中国访学的一位年轻智利学者回国前曾深情表白,他所看到的浙江美丽乡村,比那些大城市更让他难忘。对这位生长在拉美高度贫富分化的都市、深知“全球南方”普遍存在着“都市病”的青年来说,绿水青山中的和美浙江乡村,才是宜居的人类理想家园。而2023年第一次来浙江乡村调研的一位津巴布韦年轻生态学家,则迷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浙江的“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创新实践,正在致力于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他对津巴布韦本国的经济和生态发展计划的研究。

基层治理与乡村共同体建设

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紧密相连。从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武义的“后陈经验”,浙江乡村有丰富的基层治理和基层民主创新经验。在缙云县,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们在壶镇镇湖川村村书记的讲述中,了解“千万工程”如何落地和老年居家养老中心如何运营的故事;在新碧街道福康村村书记的分享中,了解旧村改造和基层治理的经验。他们在看到村庄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以及强大的村庄共同体凝聚力的同时,深刻认识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基层党组织,一位能起起共产党员先锋作用和村庄发展“领头雁”作用的“双肩挑”村书记,是实现村庄善治的关键。

笔者不久前在厄日利亚调研期间,就听到一位当地中资企业负责人说,他有心组织一批厄日利亚的“村长”到浙江向优秀村书记学习。尽管不是任何“全球南方”国家的乡村都可以学习到中国乡村的制度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的传统乡村社会,就没有自己独特的村庄治理和村社共同体理念。在“浙江探索”的引领下,也许这些乡村社会中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得到激发和弘扬,进而发展出符合各地村庄实际的更有效的治理体制机制。

农耕积淀与共同富裕理念

乌干达嫁到遂昌的非洲媳妇Rose通过组建电商直播“共富工坊”,致力于推广遂昌长粽、高山茶、羊肚菌、三叶青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带动当地村民增收900余万元;丽水农村妇女李春萌在首届哈拉雷论坛上作《茭白种植:我的共富故事》主题演讲,给津巴布韦带去发展种植业带领乡亲们致富的经验;津巴布韦政府一位女部长在听完笔者基于浙江乡村振兴经验的“全球南方”乡村发展道路演讲后说,浙江乡村从产业到文化全面振兴的经验,极大地强化了她发展好津巴布韦农村的信心,“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青年,还可以回归乡村,致力于乡村建设”……从这一层面上,也许浙江的探索对于“全球南方”,尤其是“全球南方”乡村发展的意义,不仅存在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实践中,也存在于浙江农民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实践中,更存在于已经在浙江城乡深入人心的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及“创新致富、勤劳致富、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共识中。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0期)上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排在今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反映了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从外部环境看,特朗普新一轮加征关税带来不确定性。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有可能大幅下降,即便考虑价格竞争力和潜在的人民币贬值,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适度增长,总体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出口增速回落扩大内需压力。

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主要在投资。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采取发债上项目,通过扩大投资和产能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日趋凸显,而且加剧供给和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往往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而随着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不仅会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也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如果消费走低与出口下降形成叠加效应,将进一步增大经济下行压力。如何有效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过去在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

和工具,但在促进和提振消费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实施效果也不甚明显。消费是最终需求,扩大国内需求要在提振消费上更加积极有为,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

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要发挥提高居民收入对扩大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才会提升。

二是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服务消费产品供给单一,难以适应中高收入人群的多样性、差异化需求。建议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多元化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扩容升级。

三是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研究表明,若农业转移人口按城市居民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的消费潜力。

四是增强年轻群体消费活力。“90后”“00后”新生代群体是消费主力军,这个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催生消费创新、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重要力量。激活新生代群体消费活力,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

同时要看到,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短期内扩大内需仍需发挥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撬动更广泛的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环节补短板,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的投资,促进形成投资与消费互动机制。

赵月枝

推动联村共建 助力共同富裕

徐瑾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党中央交给浙江的重大使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明确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今年,浙江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示范建设的目标与路径,提出以“千万工程”为牵引,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路径,以缩小“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2025年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2035年全省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是共富,关键在农村。近年来,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加快绘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新画卷,2024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24年和40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83,但相较于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省域内各地的农村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探索推动高水平的联村共建,突出高质量的片区化打造,对于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联村共建的重要意义

联村共建是推动“千万工程”再出发的重大探索。2023年6月,省委、省政府通过《关于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 全面打造乡村振兴

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明确未来五年发展目标。2024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浙江省“千万工程”升级版新篇章。推进联村共建,对于促进乡村振兴由“单点成线”迈入“强片拓面”新阶段,引领带动发展理念、农村生态、农村产业、基层治理、城乡关系等农村经济社会全领域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联村共建是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途径。加快推进联村共建,促进村镇联动、村落连片,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党建联合体,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和优势互补,实现共享资源、节约要素、共同发展。

联村共建是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法。省委提出,要一体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推进联村共建,是打破就村抓村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的创新工作方法,对于形成问题共答、有序衔接的“一盘棋”,具有重要作用。

联村共建要从五方面发力

一是聚焦规划联绘,进一步提升乡村承载力。按照各村、片区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人口变化趋势等特点,根据“强弱整合”“强强联合”“弱弱组合”等特征,优化村庄布局,将一定数量的行政村整合跨村联建片区,转合撤留,重构“重点村、中心村、基层村”格局,形成“村域+村庄”的模式,实现村域层面形成全域全要素空间布局、村庄层面重点实施详细设

计,深入打造区域统筹、多方联动的的发展联合体、党建共同体,达到片区乡村同质化整合、专业化分工、特色化发展的效果。此外,要深化改革,通过集中流转、“飞地”置换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为引育高质量项目和高水平团队打下基础。

二是聚焦片区联动,进一步提升运维高效性。将运营乡村理念根植于全省“三农”工作,加快“整村”“跨村”“片区”运营,形成产村业态匹配、文旅带动、固强补弱、共同推进的格局。一方面,积极创新运营方式。完善“政府引导+村企运营+利益共享”机制体系,以组团式、片组化等要素整合的“联合经营”“委托运营”模式,统一经营村级集体存量资产。另一方面,明晰职责。健全政策体系、修订村规民约、完善运营章程和明确考核奖励办法等,建立“基本报酬+绩效考核+集体经济发展奖励”的村干部报酬制度,激励发展集体经济积极性。

三是聚焦产业联营,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硬实力。将做大做强农村特色产业作为关键环节,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积极打造特色产业链。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坚持集群化发展,做大做强嘉兴粽子、西湖龙井、慈溪杨梅、宁波汤圆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工业,建立起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做强特色旅游。全面建强红色旅游乡村,持续建强乡村休闲旅游、沉浸式康养等融合产业,创造乡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要加强农业农村领域“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框架建设,深化农业农村投资“一件事+明白纸”集成改革,进一步优化乡村营商环境。

四是聚焦服务联享,进一步提升城乡均衡性。深化改革,争取在农村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农村“三块地”改革、“大三农”统筹机制、资源要素保障机制上实现新突破,畅通农民、村集体、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渠道。推动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完善全民覆盖、城乡一体、优质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县域内融合型、紧密型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发展及高水平建设县域医共体。锚定城乡接合部、村村毗邻带等治理薄弱点,探索“片区公约”“片区共商”等做法,通过统一采购项目、统一收费标准等,有效解决基层服务效率低、管理碎片化等问题。

五是聚焦部门联合,进一步提升要素保障力。通过“责任捆绑”“组团作战”等模式,实现资源要素向联建片区集中。强化政策保障,推进更多资源、要素向片区集成配置,在片区发展资金、用地指标、空间规划等政策上强化一致性。强化资金保障,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财政投入统计调度,探索成立全省乡村振兴产业基金,按照“资金跟着片区走”的思路,对片区优先给予政策扶持。强化土地保障,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用于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作者为宁波工程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